

ZHONGWAI
SIXIANG
SHI

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中外思想史

◎ 负红阳 杜振虎 吴兴洲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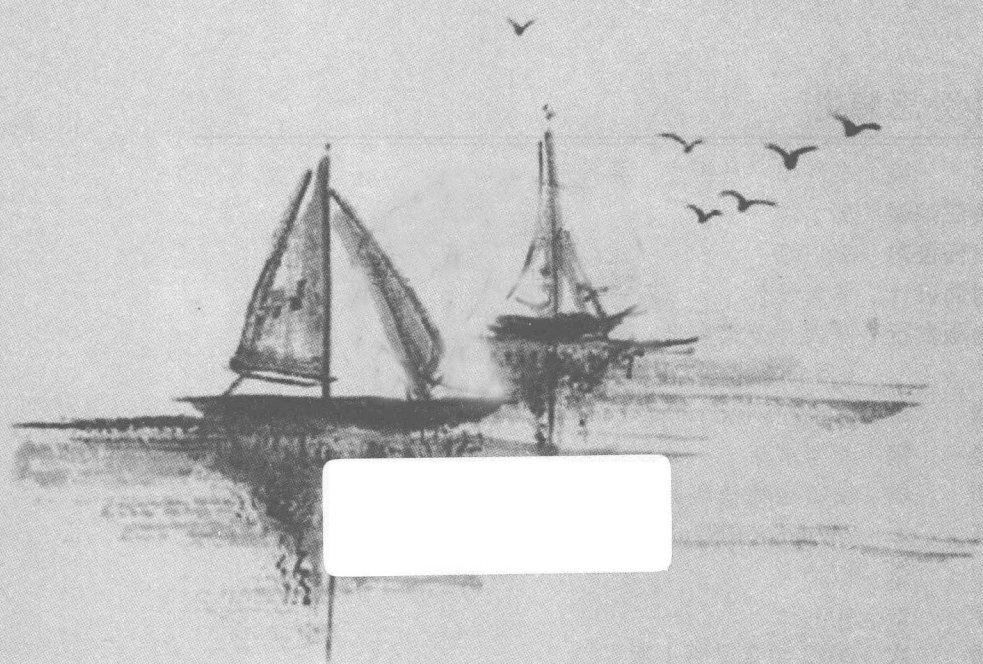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中外思想史

主编 贡红阳 杜振虎 吴兴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JC13N0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思想史 / 负红阳, 杜振虎, 吴兴洲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 2

ISBN 978 - 7 - 5613 - 6945 - 6

I. ①中… II. ①负… ②杜… ③吴… III. ①思想史—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4967 号

中外思想史

主 编	负红阳 杜振虎 吴兴洲
责任编辑	郭 颂
责任校对	郭 颂
封面设计	鼎新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6945 - 6
定 价	34.5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3622(兼传真) 85307826

前

言

漫长的人类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盛的精神遗产，不单是文明没有中断的中华民族，还是灿烂多彩的西方世界，都为延续固有观念而在不断地探索进取，几番焦虑，几多欢心，明晰的图案，完整的线索逐渐汇聚成一种理性的认知方式，形成普遍意义的共识。随着时代的变迁，阶段性的升华，这种共识就是一条只有起始而无止境的求索道路，这也是思想史按照辩证主义发展的必然途径。

本书取名《中外思想史》，把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糅合在一起，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开启于共同需求的思想之路在本质上是沒有明显分别的。东方思想圣哲孔子与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作为时代相同而地域不同的代表人物，他们从人的本性着眼，认为道德具有普遍的规范作用，遵守道德是高尚品格的自然展示。孔子以“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的体现。苏格拉底有句名言：“知识即美德”。色诺芬也说，一切美德都是知识，一切借助美德都是符合道德的，有知识的人宁要美德而无知的人则不能做到这一点。不单如此，他们身体力行的言语也极具普遍意义，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和苏格拉底的“自知己之无知”不都流露出了谦虚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吗？既然东西方思想如此的相近，那么把它们集合在一部教材里，对学生全面而简洁地了解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正是一个最好的抉择。

但是毕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还是有诸多的差异。儒学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和主体，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在外延上的繁盛；西方思想却因地域不同而有古希腊思想、基督教思想、理性思想等。相比较而言，中华民族生息在一个相对优良的地理区域，自然界供养先民的物质远大于所带来的灾难，稳定安享的心态必然演化出对秩序的遵守，更看重人的内心修为，从人的视野衍生出人同天、地的关系，进而形成道、气、理等各类学说。而从孔子时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基本完成了人、神分野，中国思想家已开始把人作为思考的对象，中国人文思想的涌动比西方发生得要早一些，宗教观念逐渐被淡化。封建社会时期，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乃至法律条文都在于规约人的道德行为，集权意识之下人完全是“社会的政治动物”。在地形多样、自然环境难以确定的西方世界，

人们急切需要解决的是生存危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鲜明地喊出要人掌控自然的愿望。但本身的羸弱与认知的低下又使得需要有能拯救灵魂的绝对概念。自新柏拉图主义成为普遍认可的哲学思想之后，神的世界产生，宗教固然有其需要屏蔽的极端性和不可理喻性，然而对精神的规劝和压抑却造就出欧洲人文主义的一道亮光，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理性思想冲破了宗教的阴霾，唱响出人的尊贵、人的高傲和人的理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仅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理解，中国思想史贯穿始终的信念是，人是适应社会的积极响应者，人只需在已有规则范围之内循序渐进地走向未来。西方思想史贯穿前后的是张扬人的主动参与性，人们在制定又推翻，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道路上走向未来。既然存在着这些不同，所以在这部教材中也就有必要将两者分别对待，分开描述。

我们极尽努力，详加梳理，编纂《中外思想史》就是寄望于在铺陈思想史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当中，为大学生敞开一扇理性知识的大门。学习思想史，可以从中国思想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西方思想中获得应有的智慧，在扩展学识视野的基础上达到提升思维能力，完善道德修养，增强身心素养，在社会实践中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

《中外思想史》编写组

2013年1月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上古三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

- 第一节 上古中国思想的萌芽 (1)
- 第二节 夏商周的宗教神灵信仰 (7)
-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德治”和礼制思想 (11)
- 第四节 《周易》和原始阴阳五行思想 (14)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争鸣

- 第一节 儒家思想 (21)
- 第二节 墨家思想 (31)
- 第三节 道家思想 (34)
- 第四节 名家和阴阳家思想 (37)
- 第五节 法家思想 (40)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思想世界

- 第一节 法家思想在秦朝的独尊与汉初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 (43)
- 第二节 西汉初期儒学的复兴 (49)
- 第三节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52)
- 第四节 谶纬神学的盛行和东汉官方经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56)
- 第五节 扬雄和王充的反神学迷信思想 (62)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

- 第一节 魏晋玄学 (65)
- 第二节 佛学的传播与思想创新 (70)
- 第三节 道教的发展和理论完善 (74)

第五章 隋唐时期儒佛道的鼎立

- 第一节 隋唐时期儒学的复兴和发展 (80)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道教思想 (88)
-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与佛教中国化 (92)

第六章 宋元明时期的理学思潮

- 第一节 北宋时期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100)
- 第二节 南宋时期理学的展开和集成 (107)
- 第三节 元明时期理学的转折和解构 (112)

第七章 清代学术思想和中国启蒙思潮

-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和经世启蒙思潮 (117)
- 第二节 清代中期学术思想的两座高峰 (121)
- 第三节 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和道咸经世派的思想启蒙 (124)
- 第四节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民主革命思想启蒙 (133)
- 第五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思想启蒙 (137)

第八章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

- 第一节 五四以后的儒学复兴 (142)
-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新儒学思想 (147)
- 第三节 20 世纪 50 - 70 年代的港台新儒学思想 (153)
- 第四节 20 世纪 70 - 90 年代的海外新儒学思想 (157)
- 第五节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的大陆新儒学和林安梧的后新儒学 (161)

第九章 古希腊时期的思想

- 第一节 希腊早期的自然观念和智者学派的思想 (165)
- 第二节 希腊城邦时期的思想 (168)
- 第三节 希腊化时期的思想 (174)

第十章 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

- 第一节 中世纪的历史进程 (177)
- 第二节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179)
- 第三节 基督教产生的思想原因 (180)
- 第四节 教父学派及奥古斯丁 (182)
- 第五节 经院哲学 (185)

第十一章 近世前期的西方思想

-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 (190)
- 第二节 开启民族意识的宗教改革 (196)
- 第三节 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思想 (201)

第十二章 近代后期的西方思想

- 第一节 自然科学的新发展 (207)
- 第二节 实证主义思想 (208)
- 第三节 功利主义思想 (211)
- 第四节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 (215)

第十三章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 (221)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	(226)
第十四章 18 世纪美国的民主思想	
第一节 18 世纪的美国社会现状	(230)
第二节 潘恩的民主思想	(231)
第三节 杰斐逊的民主思想	(233)
第四节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235)
第十五章 现代西方思想流派	
第一节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240)
第二节 保守主义	(242)
第三节 实用主义	(245)
第四节 逻辑经验主义	(247)
第五节 存在主义	(248)
第六节 非理性及精神分析法	(251)
第七节 凯恩斯主义	(252)
第十六章 当代西方思想的多样性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	(253)
第二节 福利国家思想	(256)
第三节 多样的社会学思想	(258)
第四节 新史学	(262)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	(264)
参考文献	(269)
后 记	(272)

第一章

上古三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

上古时代是中国思想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最先出现的有体系的思想是迷信、宗教、幻想、神话，其世界观也呈现有神论的形态。灵魂不灭观念初步打开了人类的思想世界，与其相联系的原始宗教也经历了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不同发展阶段。史前神话中也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人们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信心和美好愿望。颛顼时进行了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命南正重管理宗教事务，火正黎管理世俗事务，消除了“民神杂糅”即自由祭祀、人人可与鬼神交通的混乱。还规定担任专门教职人员者要符合很高的条件，各级宗教事务职官必须是历史上著名氏族的后代，这种规定成为制度，形成巫觋阶层，完成了王权对宗教事务的垄断，标志着政治与宗教结合传统的正式形成。

夏商时期（前 2070—前 1600—前 1046）实行政教合一，宗教仪式成为国家典礼，宗教制度成为国家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宗教崇拜的对象主要有上帝、祖先神和自然神，上帝已成为超自然神，祖先神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祭祀的主要对象，自然神则成为上帝的臣工。西周时期（前 1045—前 770）建立了天命神学思想体系。西周初年在学术思想上富有建树，箕子向周武王述“洪范九畴”，即大禹的九类治国大法。又相传文王有“演易”之举，《周易》成书，周公阐发了德治思想，均表明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政治思想，是与宗法伦理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周初的德治思想，在西周中、后期又有所发展，把德与刑统一起来，把德治与天下之“利”、农业生产、言论自由联系了起来。周幽王时伯阳父关于地震和史伯关于“和”“同”的议论，可以看做西周学术思想发展的总结。

第一节 上古中国思想的萌芽

上古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萌芽了灵魂不灭、图腾崇拜、祖先神崇拜、审美意识、天地四方观、太阳神崇拜、礼仪等思想观念。

一、灵魂与灵魂不灭观念的产生

人类思想历史的开端，在于灵魂观念，它是人类诞生以来第一个能反映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的观念形式，是人们幻想的寓于人体又主宰人体的观念。

灵魂与灵魂不灭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原始人类的愚昧和狭隘所造成的，主要根源于人

们对生命秘密的无知。灵与魂本为两种观念，灵即万物有灵观念，认为宇宙万物都像原始人类一样具有生命；魂的观念的产生则与梦，与人们对昏迷、濒死体验和死亡的思考有关；以后灵与魂两种观念合而为一称灵魂观念。人类在探寻自然奥秘的过程中，用自身类比的方法，认为各种自然之物同人一样也有各自的灵魂存在，这便是万物有灵的观念。人们还看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活动的，例如太阳的早起晚落、刮风、下雨、地震、山崩等，这一切活动就是万物有灵观念的证明。梦是一种人类早期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常常为梦所困扰，受梦的影响，逐渐产生了魂的观念，人们相信人在做梦时就是灵魂离开了身体到处游荡，梦境就是灵魂所见所闻。昏迷是意识丧失的一种严重病情。濒死体验，指的是濒死者呼吸停止后，大脑缺少适当的氧气，就会破坏日常的精神控制，产生各种幻觉，包括对自己身体所处的空间位置产生错觉。原始人类对死亡的思考不仅产生和加强了人有灵魂的观念，而且产生了灵魂出窍、灵魂不死的观念。当他们看到人死后不会言语，不能行动，肉体由僵硬直至腐烂的过程，却在梦境中又看到已死去的人活灵活现地出现，由此认为人不仅有灵魂，而且人的灵魂会离开肉体（灵魂出窍）且不会死去，这便是灵魂不灭的观念。

考古发现了一些与灵魂观念相关的重要现象，如山顶洞人有意识地在死者身上和周围撒上了许多赤铁矿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洛阳王湾、华县元君庙等地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也多撒有氧化铁矿粉，陶寺龙山文化的尸骨上也撒有朱砂，这种红色除了有避邪的宗教意识外，还代表着人体内流动着的血液，可能表示生者与死者的血缘联系，或被看做灵魂崇拜的表现形式。仰韶文化流行的瓮棺葬，其葬具以瓮为主，另用盆或钵作盖，盆或钵的底部往往凿有小孔，小孔被认为是供灵魂出入之用。云南元谋大敦子等新石器时代的瓮棺上也有类似的小孔，这说明当时人们不仅对同伴的死亡极为关注，进而思考和猜想死者的未来生活，幻化和构想出一个超现实的非人间的精神世界——灵魂的世界。河南临汝发现的“鹳鱼石斧图”，图绘于陶缸上，陶缸是用来装殓尸骨的葬具，可称为陶棺。鸟衔鱼、鸟啄鱼、鸟鱼相戏图像就代表着远古先民对死亡和宇宙的理解，即灵魂不灭、灵魂有知、灵魂飞升、生命转化。所以，灵魂观念的产生直接影响到了丧葬绘画的产生与发展。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又出现了杀人殉葬及厚葬现象，更是灵魂不死观念的突出表现，包括在墓葬中放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随葬品，都是这一观念的反映。从此，中国思想历史长河中，坚固地树立起了“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更引发了中国人的厚葬之风。

二、自然崇拜向图腾崇拜的演进

原始人类对动植物的强烈依赖，产生了对动植物的图腾崇拜。万物有灵观念最早仅限于动物界，因为在自然界，动物与人的关系最为紧密。在早期人类看来，只有动物才是有生命的，与自己同类的，并且对人类起着某种特殊作用。植物也是如此，尤其在原始农业出现后，原始人从植物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甚至枯萎的生长过程中，领悟到植物或许与动物一样，同样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灵魂，就有成为神的可能，于是产生了对植物神的崇拜。自然界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的需要，还具有保护自己集团成员的巨大力量，这样，人们对自然的解释就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了。这时，人们在众多的自然崇拜物中，选定出若干种被认为是集团成员最为密切、最亲近、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对象，将它们放

在特殊的位置上，采用一定的专门仪式，经常对之顶礼膜拜，以期能得到它们的庇护和好处。这种动植物或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敬，这种尊敬往往被解释为一种信仰，按此信仰，每个氏族成员都是图腾的亲属，甚至是后代，因而将它们的形象或名称奉为自己氏族或部落组织的神圣标志，围绕它们进行各种频繁的崇拜活动，这就进入了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阶段。

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了大量的图腾遗物，尤其是在与炎黄时代相对应的仰韶文化时期，发现彩陶上多绘有写实或写意的动物纹样。较常见的诸如鱼纹、蛙纹、鸟纹、鹿纹、壁虎纹等等，如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陶盆，即有“寓人于鱼”或“鱼生人”的涵义，说明半坡氏族的祖先是鱼，鱼是半坡氏族的图腾崇拜物；临汝的彩陶鹳鱼石斧图，鹳代表了以鸟为图腾的部族，鱼代表了以鱼为图腾的部族，整个图案反映的是鸟部族与鱼部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时期的图腾崇拜已明显地脱离了其原始形态，从而步入转型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由纯粹的动植物信仰而转为动植物与氏族酋长连接在一起。龙的出现，是反映炎黄时代图腾文化转型的又一重要实例，如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有蚌塑的龙；宝鸡北首岭曾出土一件彩陶壶，在腹肩部用黑彩在红色陶地上绘了一只水鸟啄着一个动物，鱼头，巨腮，有鳞纹，外形很像后来的蟠龙；湖北黄梅焦墩也曾发现一条用鹅卵石摆塑的巨龙；查海玉龙、三星他拉玉龙、红山文化C形玉龙、玉猪龙等，更是成为了中国文明发端的标志物，人们把龙当做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国龙崇拜的产生，是一种很伟大的思想升华，龙形象中所显示的不应只是龙身体上的视觉感，不只是多种自然形象的融合，更重要的是蕴涵其中的精神性的融合，这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财富。

三、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最初形态

人类对自己真正祖先的确认，即从自然物到人，确实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亡魂可能被想象成“鬼”；人的死亡有不同的原因和情状，也就想象出各种各样的鬼，替它们取了各种称呼。人们从现实生活的感受出发，把鬼分成善良的和凶恶的两类。这种分类最初也不一定是十分明确的，往往在同一类鬼的身上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凶恶的一面，就像是一个具体的人一样。渐渐地又将众鬼中能耐最大的、具有超自然性的上升为“神”，鬼或神的观念产生了。在众多的鬼魂当中，人们对于自己氏族或部落亡故的头人和巫师等，总是怀有特别崇敬的心情，这些人多半具有组织与领导才能，有着高超的生产、战斗的技艺本领，以及出众的智慧和勇敢的品格，人们认为他们的灵魂在另一世界维系着氏族的、家族的、亲族的制度，庇护着自己的子孙后代，具有降福本氏族、本家族的神秘力量。于是灵魂信仰与氏族观念、家族观念结合，人类由此进入祖先崇拜阶段。

陶祖和石祖的出现标志着祖先崇拜的兴起，其中也蕴涵了丰富的生殖崇拜观念。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陶祖（陶制男根）在许多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发现，如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仰韶文化晚期，甘肃甘谷地儿马家窑文化，临夏张家嘴齐家文化等遗存都出土过陶祖。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的瓮棺葬具上的彩绘图案中，有四幅男性生殖崇拜图案是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生殖崇拜现象的有力证据，图案对男性生殖器极尽渲染，画面生动形象，祈求生育的寓意深刻，显然不属于男性生殖崇拜肇始阶段的产物，如果结

合河南郟县水泉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祖等现象来考察,那么崇拜男根这种习俗应追溯到距今7000年以前。山东潍坊大汶口文化,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陕西华县泉护村、西安客省庄和河南信阳三里店等龙山文化也都有陶祖出土。考古还发现了一些有关女神崇拜的实物,如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出土陶塑裸体孕妇立像及大型女坐像;河北滦平后台子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六件石雕孕妇像;内蒙古林西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两件石雕女像;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白音长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石雕女像;陕西扶风案板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陶塑裸体孕妇坐像;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大型泥塑女神头像及女像残块。

四、中国审美意识的最初形态

上古人类的生活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蕴涵着丰富而且内容深刻的审美意识,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工艺,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的运用,乐器的使用以及文字的发明等方面。

原始人类打制或磨制的劳动工具及其制作工艺中渗入了朴素的审美理想,实用功能和审美形式相互交织,使得工具的造型和工艺呈现多样化的形态,成为后代审美意识的滥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作多追求石器的外在形式,元谋人已经制造了形状相对规整且方便实用的石器工具,显示了元谋人对于均衡和对比的朦胧意识;蓝田人制作了砍砸器、刮削器等,北京人打制出了石锤、石刀和石锥、石球。中期的石器制作又形成了新的合规律的形式要求,如节律、均匀、规整和光滑等,丁村人制作的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器型多样,许家窑人不但刮削器等比以前复杂精巧得多,而且出现了一些细石器的基型,表明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均衡和对称等审美的形式规律。晚期则在器物制造工艺、器物造型、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制造工具时,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选用石料,对于石器原料的色彩有了讲究,磨制技术和钻孔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打制和磨制的双重工艺,使得审美意识在对石料的技术性征服中得以自物态化。峙峪文化出土的石镞,有圆、尖两种底边,用压制法作出锐尖和周边,造型两侧对称,压痕细密匀称,具有拙稚的韵律感,石器形式更加美观、规整,尤其是云南塘子沟出土的角锥上还留有简单的刻纹。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装饰性逐渐成为器物造型的重要因素,装饰与造型并行发展,有的甚至更注重器物的装饰性,形式因素逐步在石器的造型和纹饰中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陶器、玉器等新的器物种类出现。无论是从半坡、庙底沟、马家窑到河姆渡、良渚、大汶口、龙山的彩陶和灰陶,还是从红山到崧泽、良渚的北方玉器和南方玉器,都体现了原始人类从仿生、象形到写意、象征的审美思维的发展,从制物尚器、制器尚象向因料制宜、因物赋形的艺术构思转换。其构思独特的造型、风格多变的纹饰,以及感性与理性相交融的整体构图,造就了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中国器物制造的审美基础。

用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创造出生动而古朴的动植物形象,体现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美感和对自然界的挚爱。仰韶文化时期陶器内壁鱼的图案,线条强劲流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鱼的特征;庙底沟出土的夹砂陶器残片塑有卧伏形状的壁虎,表现了将要甩尾远逃的动感;半坡陶盆上绘有四只想象力简单的小鹿,充满了跳跃奔突的情趣;河姆渡文化雕刻

精细的象牙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吭鸣啼的双鸟，陶塑中有略显肥胖的憨厚的小猪。所有这些，皆充满了和谐、乐观的精神，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气象跃然而出。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字就是从刻画符号发展而来，半坡遗址发现刻画符号 27 个，姜寨发现 38 个，秦安大地湾发现 10 多个，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约 6000 年；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辞章式陶文，距今 4200—4000 年之间，表明当时已经有成文形式文书出现。五帝时代又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也是五帝时代精神文明方面的重大事件。

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歌舞升平和乐器的使用，是当时人们文化心态的自然表露。青海大通马家窑遗址的彩绘舞蹈图案陶盆内壁画有三组舞蹈图案，每组有五位身材苗条匀称的年轻女子，倾侧摆动，双腿稍曲，似乎准备迈出舞步，每组人物手儿相牵，步伐相同，发辫、身后尾饰随节奏向同一方向摆动。尾饰可能是对动物尾巴的模拟，应是欢庆狩猎胜利的舞蹈。三组图案均在内壁上部，是独具匠心的安排，盆中水不太多时，会使舞蹈者的倩影倒映于水中，这种美好的意境绝妙地显现了先民们良好的审美意识，透视了人们对自然、对生活极度美好的遐想。这种舞蹈花纹装饰，确非出于幻想或想象，而应是史前人类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反映。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座房基上绘有一幅地画，画面上部人物均手握棍棒类器物，双脚交叉，作行走状，下部用黑线绘长方框，框内绘两只动物图案。画中二人应是在跳舞，形象与上述舞蹈纹彩陶盆相似。考古发现的乐器有骨笛、陶埙、特磬、鼙鼓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三十余支 8000 多年前的骨笛，用其中一支吹奏河北民歌《小白菜》的录音发布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站上，震惊了全世界。因此证明，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已远远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五、“天地四方”观念和天空中多个太阳的思想

对自然认识的升华，较为重要的是“天地四方”观念的产生，它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有了“天经地义”的原初起点，它也约定俗成地成为了制约人们行为的天地法则；而当早期国家出现之后，“天地四方”观念似乎又成为国家意识，那些富含象征意义的礼器具有与世界的同构性，这也应是人们最初对宇宙的看法。濮阳西水坡发现的按东龙西虎方位摆置的蚌塑图案，和一个摆在北边方位的北斗图案，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天象图，把我国传统天文学四象体系的起源提前了近四千年。考古发现了大量玉琮和玉璧，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饰以动物纹样的玉器。其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内部又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中间是空的，象征天地上下相通，所以可以在祭祀时供奉天地，拥有沟通天地、接引鬼神的神秘力量。玉璧是一种圆板形、片状、中部有孔的玉器，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天圆地方”。安徽凌家滩发现的玉龟玉版，上面刻有很富神秘意味的指向四方及八方、外方内圆的图案。玉版，长方形，正面略弧，琢磨三条凹边。正面，围绕着中心，刻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圈。在内圆里，刻方心八角形图案，内外圆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割为八等份。在每一份中各刻有一个圭状箭头。在外圆和玉版的四角之间，也各刻有一个圭状箭头。两短边的边沿，各钻有 5 个圆孔；在无凹边的长边钻 4 个圆孔，有凹边的长边钻 9 个圆孔。圆圈内外与四边垂直的圭形纹饰代表四方，再加上另四个圭形纹饰的指向，代表八方。大圆外指向玉版四角的圭形纹饰，则代表了四维或四隅的指向。四边的钻孔，一长边四孔的，代表大地之四极即四方极远之地，也指大地四

方之极；两短边各五孔者，表示东南西北中五方；另一条长边的九孔，指九天或九野，指天的中央和八方。从此看，古代中国很早就萌芽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观念。

太阳崇拜和天空中有多个太阳的思想，在史前时期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一思想不仅有文献记载，而且也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如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两件彩陶钵上都绘有12个太阳，这说明大河村人曾有过天空中有12个太阳的概念，可能代表了一年的12个月，证明当时已有历法观念。河南杞县鹿台岗Ⅱ号遗迹由11个圆形土墩组成，其中部为一大圆墩，周围均匀分布有10个小圆墩，10个小圆墩形成一个大圆圈，这十一个圆墩是用来代表太阳的，Ⅱ号遗迹应是专门用于祭祀太阳的祭坛遗迹无疑。对太阳神的崇拜，也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屈家岭、马厂等遗址的陶器上也发现了许多表现太阳图形的十字纹和十字变形纹饰，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四川珙县、云南沧源、广西南明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上也出现了太阳神形象。华县泉护村出土的日鸟纹彩陶片上，画着一只鸟背负一日而飞，这可能是中国太阳神神话最早的形象反映了，最初中国人认为太阳的东升西落是由鸟背着从东飞到西的。

六、原始宗教中的礼仪观念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但它的起源又与多种社会因素相关，最重要的还是与祭祀活动有关。这些祭祀，或为氏族、部落的祭祀活动，或为前国家形态的祭祀活动，反映原始宗教礼仪观念的载体则是考古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及其随葬的成组礼器和大型祭坛建筑。舞阳贾湖遗址344号墓出土有8个龟甲，随葬品远远多于其他墓葬，而且类型较为复杂，制作精美的权形骨器、牙器、龟甲皆非实用器，应该是与某种宗教仪式有关的器物，这种宗教仪式可能是占卜或巫术，骨笛可能是占卜或巫术进行时歌舞的伴奏乐器，墓主人应该是一位巫师。兴隆洼遗址发现的居室葬，其中118号墓是人与两头整猪合葬，随葬品也很丰富，体现了兴隆洼先民祭祖活动与狩猎祭祀活动的结合，也反映了他们对猪灵的图腾崇拜，墓主人也可能是一位巫师。考古发现的大型祭坛等礼仪性建筑遗址有如辽宁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石砌而成，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南北方圆对应，具有我国建筑的传统特色；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冢、坛、庙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女神庙和积石冢群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使人们对史前宗教发展水平大为惊叹，女神庙是宗庙的萌芽；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数量众多规模较大的祭坛，处于人工堆筑的熟土堆之上或自然山丘顶部，结构多为三重，中间的土坛以灰土围沟或祭祀坑、河道界隔，并且祭坛与大型墓地共存，一批随葬大量精美玉礼器的大墓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形似“土筑金字塔”，显示出贵族墓地与祭坛的特殊关系。墓葬的死者，生前一定是从事宗教活动、掌管祭祀大权，死后才被埋葬在祭坛附近的，有的甚至打破祭坛。修筑祭坛势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加强管理，是难以想象的。它们绝非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的力量所能及，而应是若干部落联合营建的，或者是若干村落的居民所营建的。而这个组织机构的成员，无疑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贵族。换言之，也只有像炎帝、黄帝、颛顼这样颇孚众望的巫师权贵，才能担当此任。他们既是巫师，同时又是部落的首领，在整个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史前时期从旧石器时代以灵魂观念为宗教意识的中心内容，到新石器时代以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中逐渐增加了文明意识、制度意识、国家意识等内容，原始宗教呈现出了多种形式，显示了史前人类的宗教思想观念的萌芽状况，表现出宗教活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突出特点，并出现了通人神的巫师阶层，最终使早期中国思想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

第二节 夏商周的宗教神灵信仰

《礼记·表记》以“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等话语说明了孔子对三代事鬼神之道及其得失的基本认识。孔子认为，夏代的为政之道，尊重四时政教之命，使人勤于民事，事鬼敬神而远之，专以人道为教，以忠恕养于民；殷人为政之道，尊奉神灵，率民奉事鬼神，重视鬼神而轻视礼法；周人为政之道，推重礼之往来之法，贵尚施惠之事，敬奉鬼神而使其远离政教，以忠恕养于民。从中可以看出三代鬼神信仰是有差别的，但详情仍难以明了。

一、夏商时代的宗教信仰

夏商时代实行政教合一，宗教仪式成为国家典礼，宗教制度成为国家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时崇拜的对象有上帝、祖先神和自然神三类。五帝时代末期已经出现的上帝，这时脱离了自然神的品格成为超自然神；从鬼神观念发展出来的祖先神地位越来越高，成为祭祀的主要对象；出现最早的自然神，这时却失去独立性而成为上帝的臣工。禹征三苗的战争，是由大巫高阳氏在玄宫向禹下达上天的命令，禹受命时有人面鸟身之神句芒捧着玉圭侍立在大巫身旁，高阳氏是颛顼的后代，玄宫是颛顼之庙，在这里的最高权威就是高阳氏，这个场面中已经出现了上帝的身影。夏建国后有扈氏反对启继位，启发动征伐战争，《尚书·甘誓》中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会予惟恭行天之罚。”有扈氏违反了规矩，天要断绝对他们的任命，所以启来实行天对有扈氏的惩罚。“五行”是自然事物，“三正”是历法，这些上古人所认为自然神所主之事，现在却成了上帝意志的体现，所以才有天惩罚“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者的逻辑。

夏代大约已经形成了至上神的观念，其宗教观念是从原始宗教中继承下来的祖先崇拜和灵魂—祖灵—崇拜。《论语·泰伯》中孔子盛赞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即说自己饮食菲薄，而尽心孝敬鬼神，敬鬼神实际是对“天”的崇拜与敬遵。夏代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声称自己的政权是得之于“天命”，《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是说夏朝的存在受命于天，说明夏代已经有了天命观念，这是中国君权神授思想的最早记载。《尚书·皋陶谟》记载了舜、禹和主管司法的大臣皋陶讨论治国问题，皋陶说，天要成就的事，由人来代替它完成；天制订的伦理规范，人要切实地执行；天制订了礼仪，使我们可以依此和睦相处；天任命了有德行的人，并给他们规定了相应的服饰；天惩罚那些有罪的人，给他们设计了五种刑罚。禹也说，尽心按上天的指示去做，天就会不断地降福。

夏代统治者又多以太阳自居，统治者降生取名又多采用“日名法”，而后羿射日的神话也应是当时社会政治混乱状况的反映，《尚书·汤誓》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种奴隶咒骂夏桀的话语，更是直指以太阳自居的夏桀。这些则又说明，夏代统治者信奉天命，自命太阳，是一种宗教信仰，天命、太阳、君主三位一体，这种信仰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自然宗教信仰的意义，上升并转接形成夏商时代统治意识的雏形。

商人信奉的神秘力量已经趋向秩序化，神灵已经谱系化。殷墟卜辞中记载了商人诸神灵，其中重要的类型：一是上帝。这是商代出现的一个新神灵，上帝信仰是商周国家信仰的主要标志，它在商人心目中是一种必须对之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违背的神灵。商王与帝的联系方式除“帝降”后可能采用的宗教仪式外，主要是占卜，相当多的涉及上帝的卜辞应是通过龟甲兽骨为媒介来探寻上帝的旨意，在卜辞中可见部分先王（及旧臣）能“宾于帝”。上帝实际可以理解为是商人幻想出来的在千变万化的自然与社会现象后面，对这些现象进行操持的主宰之神，是这些现象产生与发展的本源。在缺乏进一步的理性思维的情况下，上帝只能是可敬而不可亲的。二是自然神。商周时代，自然崇拜在国家信仰中仍占一定比重，人们信仰的对象涉及大自然的许多方面，包括地神、山神、河神、日月星辰诸神信仰等等。土（社）即土地神，农业社会当中，人们认为农业生产丰收受土地神的影响和控制，要得到农业丰收，就要祈求土地神赐福。在早期文献中，土地神被称为“土”，稍晚的时候，土地神被称为“社”。在殷墟卜辞中能够看到商族人向“某土”求年的情形，人们经常卜问是否“东土受年”、“西土受年”等等，这个“土”是指土地神。卜辞中的亳社是商人居住地的土地神，凡有商人居住之地就可以立此社，亳社即可能相当于大社，单称之“土”在卜辞中所见祭祀最盛，有可能相当于王社。还有邦社，但在卜辞中很少见，情况难以得知。岳神、河神，不能视为单纯的自然神，它们往往与高祖并祭，以自然神之身份而被奉为祖神，当类似于典籍所言稷、土（社）。卜辞中河、岳也人神化，是商人在其早期历史时期将王亥、上甲两位有功业之先祖与自然神河、岳混合之结果，成为人格化的神。河神信仰在商周时代也相当流行，河即黄河，黄河对殷人影响很大，殷的东、南、西三面均为黄河流经之地，人们信仰河神理所当然，人们相信河神控制着水，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至生命。三是祖先神，包括三个层次：其一为夔、王亥等四人，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但年代久远、世系关系已不可考的祖神。其二为上甲、上甲以后诸直系先王、旁系先王、直系先王配偶或时王已故配偶，与时王有明确世系关系的祖神。上甲及其以后的先王与王的配偶构成了比较单纯的而有秩序的祖先神系统。先王诸神灵中，以直系先王为主，被商人尊为圣王的上甲、大乙、大甲、祖乙等具有更多的权能，近三代以内的直系先王亦具有较多权能，在护佑非王贵族上受与这些贵族亲属关系的制约。先妣、母（包括“后”）之神灵主要是见于周祭卜辞的所谓先王的法定配偶。其三为旧臣、戊（巫）。部分在商王朝发展中有影响的旧臣，如伊尹、黄尹及部分戊（巫），也被认为是商民族的祖神。

各类神灵施加权能的范围主要包括：天象、年成、“我”即商王国、对敌方战争、王事、王自身、王以外贵族、诸妇、生育等九项。它们在自然、军事和人事上的权能表现是：其一，上帝具有浓厚的自然神灵特征，是自然的主宰，卜辞中反映帝能支配各种气象，如“令雨”、“令风”、“令雷”、“降旱”等，即能刮风、下雨、打雷、降旱灾，在人

事权能上帝有极大权威，不但能给商王国带来祸福，也能给王本人带来善咎，还能管理是否修建城邑或令该城邑圯毁或终止寿命，又能保佑战争，决定征伐之事，或让商王国天命长久，正因此，商代统治者借助帝的威力进行征伐和统治。其二，自然神土（社）、方基本上只具有自然权能，河神威力很大，能令雨、害雨、害云、害年、害禾、咎我、害王。令雨，是除上帝之外唯一有这种神通的神祇。害雨、害云即对云雨不利。害年、害禾即作害庄稼、年成。咎我、害王即作害于时王、咎于殷王国，具有施作用于王本身。殷人对河神的祭祀也十分隆重，使用祭祀有燎、告、侑、帝、御、祓、取、舞等三十种以上，所献牺牲最高时达到三十牛、五十牛之多，也使用人性，最多时可达二三十人，说明河神在殷人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岳神有害雨、害云、害年的功能，也有害我、弗害我、害王的能力，可见它也是跨越自然和人神的范围、权能极大的大神。殷人祭祀岳神的目的主要在于祈年求雨，所献祭祀也达三十余种，以燎祭最多，所献牺牲较河神逊色，说明其地位比河神低。岳神有自己的神庙，叫岳宗，说明岳神是山神中的大神。其三，祖神中，除夔仅具自然权能，王亥具有自然与战事权能外，上甲与其后部分直系先王则在自然、战争与人事上皆具有权能，特别是能施作用于王以外的其他贵族，甚至于王室诸妇。直系王配偶身份的女性先王，则主要作用于王与其他贵族，而尤有影响于王室妇女生育能力。商人心目中，先祖死后当升于天，在帝左右，成为商人与上帝的中介，又拥有致福、降祸的能力。殷人祖先神的作用主要有害王、害我、害年（禾）、害雨、害风、宁风、受年（禾）、告秋、宁秋等。害风是破坏刮风；宁风是使风停止，不给人们造成灾难；受年是风调雨顺，农业取得丰收。殷人尽可能地扩大祖先崇拜的范围，而且有完整周密的祭祀制度。殷人祭祖用牲量最多，祭典特别隆重。殷人认为，祖先神可以满足他们的各项祈求，不仅可以令风令雨，而且可以禳除人世间的灾难，赐下民以福佑。但在祖神中较低级的一类神灵，只能对人类社会起作用，而不能控制自然界。

商代神权信仰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宗教是商代精神文化的主题，商代神灵崇拜呈现多神崇拜的形态。夏商时代的神灵信仰应是天、帝、祖先神的多元崇拜，商代的天即上帝。除上帝以外，自然神、祖先神仍在商人宗教观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不同等级的祖先神作用的突出与深入更是不容忽视。它们不仅能作用于自然界的风云雷雨，而且能影响人类社会，影响商王的健康和商王国的命运。其次，基本上呈现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以土（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和以帝为代表的天神鼎立三足之势。祖先神和社、河、岳神并不是帝的下属神，祖先神与自然神之间也没有上下统属关系，它们并列存在，都有很大神威。这反映了殷人在精神上对自然和祖先的依赖，也说明了各种自然现象尤其是土地、黄河、大山在殷人的生活和观念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极大的影响，殷人还处在对于自身以外的力量过分依赖的阶段。最后，商代神权崇拜的重点在于祖先神，祖先崇拜在殷人宗教中占有主导地位。祖先神多是商代历史上的国王，数量特别大，有远古先祖，有女性祖先，甚至有异姓祖先，殷人相信他们有保佑殷王国长久统治的责任和能力。殷人重点祭祀祖先神，自然是出于对祖先功业的崇敬和对其历史经验的珍视，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初步胜利。卜辞显示，殷人祖先已天神化，不仅能够管理殷王朝和商王自己的事情，还能呼风唤雨，管理自然界的风调雨顺和灾异。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祖先崇拜，殷人增强了商王朝和诸方国、诸部落的联系。商王室的祖先神不仅是商王朝